

基于符号学逻辑的学校变迁^{*}

□ 崔岐恩 王志荣 赵 敏

内容提要 符号是世界被认为存在的表征,也是人之为人的证据。约 500 万年前当人猿揖别时,教育符号的能指(教育教学)与所指(生产生活)混沌未开,便开启符号化历程。有人便有了教育,而彼时学校的符号尚未产生。约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开始出现首个学校符号“校”,本原符义是:受教者接受规训的特定场所(或符号化的特定场所)。其初始符用极为简单,即工具性——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符号化机构。随着第一次、第二次教育浪潮中教育能指与所指逻辑距离拉大,学校符号持续再度符号化,被附加别样意义,如“固定化的”、“体系化的”、“政治化的”、“科学化的”、“文化的”。第三次教育浪潮中,随着 AI&VR 符号出现,教育能指与所指之间逻辑距离回归为 00,教育中心从前浪潮至第三次浪潮依次历经:无中心、教师、学生、学习。学校作为“规训与教化的特定场所”,在现实教育虚拟化与虚拟教育现实化的双重符号建构中,其“标出性”日益失去合法性地位。

关键词 学校 符号 教育 符号教育 教育符号学 符号学

作者崔岐恩,博士,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志荣、赵敏,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符号教育研究所。(温州 325035)

DOI:10.14167/j.zjss.2021.11.017

引 言

学校教育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定型于奴隶社会,守制于封建社会,革新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的历史也是那般吊诡:从流动的、生产的、散漫的、开放的“实践—模仿”(像似符)系统,进入固定的、教育的、规制的、封闭的“理论—授受”(指示符、规约符)特定规训场所,“庠”为初始学校场所,如羊牛猪圈之。符号化总是从身体开始,仰望星空云卷云舒让位于高墙大院与四角的天空,原野中追逐猎物的轨迹变形为学校环形跑道,采集野果的爬高上梯形制为操场的单双杠,

渔猎击水化为温情的游泳池……学校彻彻底底是大自然中生活场景的像似符,人之粗狂野蛮而强悍的身体被形塑为文质彬彬而精致。若以范缜《神灭论》刃利之喻论之,则身即形也,形即心也。是以身存则心存,身谢则心灭也。学校曾经圈养猪肥牛壮,而今,被符号化过度的学生何异于彼?肥胖、近视、自闭!曾经,没有学校时或者在学堂之外的师生关系何其融洽,孔子与学生在树下玉树临风、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苏格拉底与青年在广场边质疑问难、催生助产、思接千载。谁曾想,2017 年 11 月,湖南一名高中老师被自己的学生弑杀!近年更有多起学生弑母弑奶奶的恶性案件,原因固然多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面向自然语言理解的逻辑构建和符号接地问题的哲学、心理学研究”(18ZDA032);浙江教育厅项目“小学生符号意识研究”(Y202043191);温州大学侨特色项目“马来西亚华侨对中国符号的认知特征与趋势研究”(WDQP20-YB010)。


样,但他们无不是在以“学校”为符号的场域遭受创伤。学校的高墙大院正如福柯所说的社会规训场所,是在洗脑异化抑或净化心灵?符号化与反符号化、符号化不足与过度符号化、个体自然符号化与国家社会符号化成为学校场域中天天暗自较劲的主旋律。









本来,教育是非常明晰而清澈的一件事——以人生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符号化,符号化的规律是因材施教。先贤早已告诉真谛: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正如同于伟、石中英所倡导的未来学校形态“率性教育”,可惜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千百年来,政治家、法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等故弄玄虚,基于各色原因把简单的教育搞得云山雾罩,似乎只有教育学家才能知道教育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但凡有孩子的人都清楚教育怎么回事。恰如刘庆昌所言,在远古、中古、近古社会,教育不过是以较狭义的姿态作为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附庸,这件事只要在政治、经济需要的限度内做了即可,至于对它的研究并无必要。











本文拟从学校前世今生的变迁中抽丝剥茧,解密其符号逻辑。

一、符号视域的学校变迁

(一)学校的符号

“學”在构字上含有,表仿效之义。《广雅诂林》爻、象、放、视、教、學被列为—组,皆表效之义。甲骨文卜辞中,爻亦有表效之义。《尚书大传》:學,效也;朱熹言:“學之为言效也。”《说文解字》曰:學,放也。段玉裁曰:教者,与人以可放也。學者,放而像之也。即“教”是用来给人模仿的,“学”是仿而像之的。也即从符号学角度而言,学校从产生之初便是现实生活的“像似符”,而学校中的受动主体——学习者而言,则属于再度符号化,即“像似符的像似符”。

《形象字典》(vividict.com)字源解说:学,甲骨文(算筹)在算筹两边加在房屋下面加“子”,表明教的对象。有的金文加“攴”承续

金文字形。隶化后楷书将篆文的写成,将篆文的写成。俗体楷书依据草书字形将正体楷书的简化成“学字头”。古人称理论知识的训练为“学”,称生活实践之体验为“习”。《说文》:校,木囚也。从木,交声。从文字符号解读:交,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叉腿而立。校,甲骨文,表示用桎桎连锁双脚,使双脚不能自由活动。符义阐释:学校中的活动(所谓狭义的教育)在本源上规制个人自由,与人的自然天性背道而驰,或者说为了成年后更好的适应生产生活而不得不预支个人自由。

由上可知,学校作为一个教育符号,其本原符义是:受教者接受规训与教化的特定场所。已有诸多文献探讨认为,中国式学校“规训”成分更多,而西方学校则“教化”成分更多。事实上,在不同学段的学校,又各有特点。

(二)学校的历程

《中国教育史》告诉我们,中国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特定场所的“学校”,即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那时学校的名字叫“庠”。高一级的大学叫“上庠”,低一级的小学叫“下庠”。夏朝(BC21-BC16)把学校又分为4个符号名称:“学”、“东序”、“西序”、“校”。正如《孟子》所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主张教育优先,学校的善教远比庙堂之上的善政更加重要,政治统治者一旦明了伦理关系,率先示范敦风化俗,则草根百姓自然就会相亲相爱。

先秦时代学校有两类,一为国学,另一乡学。国学含小学、太学,为天子或者诸侯所设,教育主要以六艺为符号内容,而乡学则以耕读书数为主要符号内容。这便是西方符号学家伯恩斯坦所言之符号的分野,前者为精致编码符号(中产以上阶层更多使用)而后者为受限编码符号(劳工阶层更多使用)。《周礼》之符号化机构“成均”乃“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均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辟雍不仅

仅是最高等级的学校,而且是敬奉祭祀天地诸神之神圣场所,彼时,正如西方孔德所言人类认知的神学阶段,符号不仅是学校教育内容,而且是沟通三界的密码,凡夫俗子须敬而远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映出掌握精致编码符号者有权对他者符号化,而受限符号者则被符号化。《论语》中,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此言也含符号意蕴:符号化首先是身体的符号化,然后是精神符号化;学习或教育无不基于先天禀赋,也即符号化主体具有身份的区隔。时至今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依然面临那种符号化问题,到底是先天条件决定了后天符号化呢,或是后天符号化决定了人生的身份?图像符号如《河洛图》是远较文字符号更为形象而玄妙的符号形式。《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其中,书、言、意、象等皆可被看作皮尔斯所谓的广义符号。

汉朝时期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其中私学的书馆,亦称蒙学,系私塾性质,相当于小学程度。汉朝把官办最高一级学校名之为“太学”,其下分曰:“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延至后期,虽然这种“特定的规训与教化之所”之所指并无大变,但其能指则变易为“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等,学校符号中明目张胆加入“国”,足显其政治意义的强力介入。汉代政治统治集团采纳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并成为后世垂范至今的意识形态主旋律。这是学校基于国家政治需要而从符形上对于教育内容的全面宰制。但是,民间学校一直或隐或显存在着,如“私塾”、“书院”、“书堂”、“学堂”等。虽其特定场所多设于名山大川、湖泽茂林,尽力远离强制符号化,但所幸独存者无几。即便归隐山林、耕读授徒,看似逃脱主流符号化,但却陷入边缘符号化,无论道、释概莫能外。

隋唐以降,科举制度使得学校成为政治规训的饰品与附庸。学校主要学习内容的文字经典符号,其符形被统治者圈定如四书五经,别的符形被视之为离经叛道,故而历史上出现无数禁书(实为常项符号对异项符号的挤兑驱逐);其符义被钦定

如朱子集注,别的符义被视之为郢书燕说,因而历史上出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实为符义封闭性向符义开放性的叛逆围剿)。清末,开始兴办近代教育,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中称学校为学堂,1907年新式学堂遍布全国。辛亥革命以后,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

由上观之,学+校并非人类生(1000-500万年前)而有之,而是在原始社会末期(-21世纪)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能指流动,所指游弋,作为再现体而越来越出离于对象之生产生活,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又通过反啮而形塑现实的学校教育系统。学校的出现是人类精神梦魇的开始,当然,在此之前,也即学校出现之前,人类遭受着更为惨烈的肉体磨难。但是没有学校之时,人的教育已经开始,教育教学活动与生产生活合二为一,也即教育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逻辑距离为零,二者融为一体。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而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供养一部分“闲人”——或许德高望重或许能力超群,也或捕猎经验丰富,他们游离于生产活动之外而在特定场所专门从事教养小孩。起初那些特定场所可能是羊圈、山洞、树下等,故《孟子》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校”的文字符号表明:人在树边接受训导,双脚交叉意味着失去奔跑的野性自由。作为特定教育场所的学校出现以后,便有了“三有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学校实际成为模仿生产生活实践的像似符,从而此前分布于荒野中、森林里、江河边的泛在学习、直接教育逐步收缩于通用符形、限定符义、专门符用之特定场所。能指与所指合二为一的直接学习逐渐被能指与所指分离的间接教育所替代。学校作为符号化的特定场所,成为社会组织中一个特殊领域和行业,虽然发端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但是随着符号化程度日益提升,其仿照现实生产生活的符号“像似性”越来越模糊,而逐步过度到指示符,并最终跃迁到规约符,也即无论从符形层次的学校场景,或符号主体的师生,抑或符码层次的教育教学体制机制都开始脱离于能指,最终窠臼于鲍德里亚所谓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异化”和“内爆”。

事实上,鲍德里亚(后现代符号学家)、福柯

(后现代符号学家)、福山(未来学家)、托夫勒(未来学家)、布迪厄(符号学家)、弗莱雷(解放教育学家)、阿普尔(批判教育学家)、涂尚(教育符号学家)、赫拉利(未来学家)等人已经听到传统学校的丧钟已经敲响。其中,鲍德里亚1976年《符号交换与死亡》的思想可以佐证学校终结的符号学本质:作为符号化的特定场所,学校在历史演化中,历经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虚拟与仿真、内爆和超现实等等,在现实教育虚拟化和虚拟教育现实化的双向耦合中建构出一个“灵境般”(翟振明之造世伦理)的符号化场域。这个符号化场域具有移动、泛在、智能、多模态等特征,传统的规训与教化场所不配享有“学校”这个符号,或者它不再被“学校”这个符号所专有。从布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来看,学校教育固然可以传承已有文化符号,但是,却也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它通过社会炼金术和魅力意识形态,就如黑帮洗钱,学校同样是上等阶层的同谋,通过符号化而将上层拥有的权力资本合法化,实质是符号固化与权利漂白。

教育在前浪潮时期,也许只是先天身强体健者在渔猎、采集野果中共同探险、模仿(少小者的行为方式成为老成者行为方式的像似符)。肇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第一次教育浪潮中,也许只是筛选少数贵族子弟接受“庠、序、校”的训导,学校教育开始成为少数特权者的专有福利,被奴役者只有终身操劳的份,统治者编造一套符号系统,忽悠底层者、边缘者的身份符号固化。那个时代的先哲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等都干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正义之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者就应该有更优越的教育,而女性和平民的不同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自然安排,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正义观),先哲之所以是先哲,就是最早的符码编造者、符号运用最得心应手者。难怪乎艾柯认为“符号学就是用于撒谎的学问”。

对于个人而言,个别符号即可达到忽悠人的目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则需调动社会中专门规制人心的特定机构,如学校——通过符号系统对人的身心进行全面符号化。又如通过政治符号“传国玉玺”对所有臣民的奴性符号化。传国玉玺作为政治符号,以天圆地方、纽交五龙之符形象征“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符

义表征皇权神授、正统合法。它已然成为现实政治权力的像似符,因而三国演义里东汉、孙策、袁氏兄弟为此符号而刀兵四起、天下大乱。与此相比,学校则是没有硝烟的符号斗争场域,对政权的关系、学习内容的制订、身体的遴选与身份的建构、学习目的和结果的认定等等,无不运用符号而映照社会生活现实。八股取士的阴柔史、科考案、文字狱,以及《官场现形记》等所撰学校荒诞剧无不反映符号斗争。寒门取士、“天下英才皆入吾彀矣”。国外批判教育学者阿普尔、金迪斯、吉鲁、鲍尔斯等,解放教育学者弗莱雷,符号学者布迪厄、福柯、伯恩斯坦等等也敏锐识破此中的符码“鬼把戏”。

二、学校嬗变的符号学逻辑

符号是世界被认为存在的表征,也是意识的对象和意义的载体。这个新时代最响亮的符号是AI&VR,这个时代的教育可名之为符号教育,与其对应的学术理论思想可名曰符号教育学。符号教育学(Semiotic Pedagogy/Education):以符号学为工具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教育学流派。符号教育学者在教育符号域(教育情境和教育活动)中观察和解释符号及其意义、探究教育符号行为的心理动机、意义及各种指称关系中的认知和释义过程,并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来认知教育现象和思考教育问题,从符号学视角描述、解释、预测、改进教育。符号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有三:符号中的教育;教育中的符号;符号与教育的关系。

若从雅各布森的符号三段论思想出发,则可如此阐释:教育就是符号发送者通过内容、文本、媒介和符码对符号接受者施加影响,使其身心得到符号意义的过程。或者说,教育:以善为灵魂、以人的生成为目的的符号创制与使用活动,包含符号的创制、解读、保存、交流、使用。该理论对课程与教学的阐释也很有启发:教育实践本质是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的意义互动,在显性层面,通过知识、课程、活动来实现主体间性的本体功能,即教与学。在隐性层面,通过知识逻辑(符形)、课程体系(符义)、教育体制(符码)的运作,来达成符用(符号之于人的功用):教育者借助符号的操弄而安身立命,成其为师者的身份地位;受教者藉由符号的扬弃而经世致用,成其为习者的人生品性。符

号学就是意义之学,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无非符号的意义表达。从这个角度看,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与教育领域的意义互动具有家族相似性。

(一)教育-符号演化中的学校形态

教育及教育学发展总与知识再现体——符号的发展休戚与共,人类进化史其实就是符号发展史。人类史、符号史与教育史具有逻辑与历史同构性,其历史演进具有趋势近似性并多有重合。人类知识再现体(符号)与教育共同经历三次革命性浪潮。在前浪潮时期,出现言语、动作、实物记事等原始符号(如结绳记事),对应于人类最初的原始教育阶段。第一次浪潮出现语言、文字等系统符号,使人类进入传统教育阶段(公元前21世纪-20世纪)。第二次浪潮出现科学符号,将人类带入现代教育阶段(1687年至今)。第三次浪潮出现虚拟符号(如虚拟现实、仿真、超真、幻象、造世、灵境),使人类迈入符号教育阶段(VR元年2016-)。若放在人类教育与符号演化史的大图景中考察学校,则其发展无不与符号同步嬗变(表1)。

符号学即意义学。意义之源在符号史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经验源泉。借用阿伦特1958年《人之

境况》思想:人之意义源泉可依次划分为:劳动(肉体生存)、生产(社会关系)、行动(公共事务)、漫游(身心解放)。只有在符号教育阶段,才真正将意义作为教育最重要目的,意味着每个个体尤其个性化存在意义,不再为肉体活命或通过对符形的记忆而葆有身份地位,也毋须为就业而提升职业能力,个体只需要成就最好的自己便可。因为符号教育学中的意义意味着开放、个性化和无限衍义,在不可能世界中探究其可能性。在那个时代,人作为一颗螺丝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人类史上,首次出现90%的人可以不劳而获、不教而学、不眠而梦。其它诸概念参见表1所列,不再一一赘述。

从表1可见,学校形态的变迁紧紧跟随教育-符号的演化脚步,因为符号演化的内在机制成为所有教育、教学、学校发展的符码。以符号为内容是所有教育的共性,但作为所指为教育高级形态的专有名词——符号教育,则始于虚拟现实元年2016年。此阶段教育中能指与所指藉由虚拟现实而拉近逻辑距离,实现充分浸入感、交互性和多通道融合,教与学在逼真甚至超真幻象中尽性。教育

表 教育-符号演化中的学校形态

	前浪潮	第一次教育浪潮	第二次教育浪潮	第三次教育浪潮
教育学	原始教育	传统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	符号教育学
时间史	500万年前	BC21	AD1687	AD2016
符号史	原始符号	语言符号	科学符号	虚拟符号
符号观	混沌世界	符形	符用	符码、符义
哲学观	神学	形而上学	科学	和
意义源	劳动	生产	行动	漫游
能指与所指逻辑距离	0	01	02	00
教育符号	像似符	指示符	规约符	多元符号
教师符号	渔猎高手	灯塔、蜡烛	灵魂工程师、园丁	服务员、心灵伴侣
学生符号	丑小鸭	存储器	工具箱	万花筒
工具符号	动作	教鞭、经书	黑板、指字棍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教育目的	活命	知识	能力	意义
教育中心	劳动	教师	学生	学习
教学内容	示范	传授封闭性经典	传授标准化教材	自选学材、师生共创
师生互动	行为像似符:模仿	单向强符号化	单向弱符号化:学以致用、问题导向	双向弱符号化:开放、弹性、泛在
学习形态	移动、模仿	记忆、重复	互动、应用	移动、浸入、游戏
学校形态	无	固定封闭单一(讲坛、教室)	固定半封闭多功能(阶梯教室、实验室等)	泛在、无形、虚拟

符号不再拘泥于像似符、指示符或规约符的类别化,也不再纠结于生活符号、科学符号、人文符号之分野,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也即展现各种的“和”面相。在符号教育学阶段,教育目的为意义,教育中心是学习,师生互动为双向若符号化,即开放、弹性、泛在。学校超越传统形态的“固定”“封闭”“有形”,代之以泛在、虚拟、无形。尽管学校所指近似,但这种能指还称为“学校”吗?

基于“学校”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再度符号化,一再被附加别样意义,今日之学校非昨日之学校,昨日之学校非本初学校。学校变迁的不仅仅是能指(如:场所、硬件、制度、主体、内容、评估等),还有巨变的所指(如:生产生活、政治体制、权威分布、关系样态、生存状态、世界形态等)。学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尚需逐层剥去附着在“学校”上的符号外衣,如何剥去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当社会存在形态发生全面的、充分的巨变,符号意识才会有相应的跃迁。在符号教育时代,至关重要的四化(生产智能化、生活虚拟化、文化多样化、政治民主化)既是地球村的发展趋势,也是教育方向的参照系,其中,政治民主化是学校终结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教育符号的多模态化

符号学中的多模态思想主要源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指交流的渠道和媒介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音乐、技术、图表、颜色等符号,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编码呈现意义的符号。当代多模态符号学家张德禄、顾曰国等认为,模态指人类通过感官(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跟外部环境(如人、动物、物件、机器等)之间的符号互动方式。人类教育从内容、目的来看,都是符号;从方式、手段、过程而言,皆为符号运作。教与学的微观行为则属于符号互动。因此,对教育的研究实质是对教育符号的探究。第一次教育浪潮时期(BC21-AD1687),教育符号重心在符形,第二次教育浪潮时期(1687-)教育符号重心在符用,第三次教育浪潮时期(2016-)教育符号重心在符义和符号。历史纵向而言,教育符号重心的嬗变,体现人类模态的跃迁,从原始的、简单的、单一的逐次演进到高级的、精致的、复合的多模态。

纯粹物质和纯粹精神所构成的世界本体到底是何种样态?这难以被人所认知,人所能感知的只

是其模像和仿真,即表征其存在的符号。符号生态世界中的模态远远超出人类想像,如蝙蝠之声波符号感应,鸽子梭鱼之磁场符号感应,等等。也许符号主体永远难以深入物自体本身,世界通过符号给予符号接受者的样态只是接受者所能接受的样子,这种样子囿于接受者的先天时空观念和先天综合判断,而综合的质料却来自于多模态的五官六感知能力。如同盲人摸象,每多一种模态则多一种“摸象之感”。人类的各种感官体验源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对所处世界的符号运作,大脑将这些符号所载之信息与意义先归类为单独模态,然后再将单独模态融合为系统化的整体体验。符号主体基于此种神奇之功,可以在阅读一个多模态符号文本时获得替代性体验。譬如,狗眼面对我们所谓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却只能感知到黑白灰三种颜色。知识、教育、学校、学习、学习者都将呈现多模态符号表征,通过语言、声音、动作、图像等符号资源进行主体间性符号互动。人类符号模态系统超越五官六感之功能而日益多模态化是必然走向,对于超声波、不可见光、磁场能量场、量子纠缠等可以通过高科技模拟符号而被人所感知,人工智能、移动终端、虚拟仿真、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推动多模态符号走向纵深,必将远离学校“四角的天空”。

符号教育学阶段,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的突进,教与学的主模态已经由语言符号、图像符号转为多模态混合。纵观整个教育发展史,其实就是模态的升级跃进史,如在最开始前教育浪潮时期(500万年前),教育教学主要依靠单一观察的视觉模态,同时有了像似符的模仿行为,则是动作模态;进而有了语言符号,则启动听觉模态。人类教育在第一次、第二次教育浪潮时期主要以听觉视觉和动作三种模态为主。在第三次教育浪潮时期(2016-),将充分挖掘五官六感的多通道融合的混合符号模态,尤其出现现实教育虚拟化与虚拟教育现实化的双重耦合,则有“脑机互联、生物芯片、心灵感应、异度空间”等等奇异模态为教育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多模态神经影像数据处理与分析已经成为医学康复、特殊教育、AI等方向的热点。市面上已经开始量产 Emotibot 多模态情感交互智能机,可以作为宅男宅女或单身狗的生活伴侣,亦可作为“陪太子读书”的伴童。但是,AI、VR等毕竟

是以数据算法等科学符号为经络,如何与情感、灵魂等人文符号充分兼容尚待时日。苹果、谷歌、百度、阿里巴巴 2016 年均已开始向此掘进。多模态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智能手机中的最酷风口,2017 年 11 月 21 日,中国三星电子发布三星人工智能平台 Bixby,它会赋予使用者人工智能多模态交互体验。

三、基于符号逻辑的学校未来

学校产生之初,基于个体的不同自然禀赋和渔猎需求,学校是分散的、个性化的、非系统的、简单的、蒙昧的。在不同群落和季节,学习内容、形式、时间分配都流动而随意,比如我们小时候在乡野学校,专门有农忙假,师生回家或者在学校周边帮助农民收割庄稼。那时,对于教育符号的编制、解码、传播,皆出自于个体经验和感悟,因为认知的局限性,其符号更多属于皮尔斯所言的像似符(icon),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逻辑距离近乎为零。也由于社会分层尚不明显,所以符号编码原始而简易,属于弱符码,如同伯恩斯坦定义的“受限符码”。故而,基于符号的学校教育可以只能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完全个性化。但随着渔猎的统一规划、小农走向庄园、山野群落归入乡村组织,学校逐渐合并、统一、系统。生产力发展了,特权阶层开始崛起。出于社会组织系统的良性运作,更源于特权者的私利,学校进一步被固化、体系化,并且加入政治符号——“天地君亲师”、“天子”、“受命于天”、“劳心者治人”、“生而知之”等等,学校开始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上等人有了合法却违背人之自然性的特有符号系统,如伯恩斯坦所言的“精致符码”,普通人难以享用。《礼记》“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反映教育的政治性。譬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断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主张“立法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青年上;忽视教育必然危及国本”。巴西教育学家弗莱雷 1970 年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深刻论述阶级社会一切教育必有政治性,揭示传统教育最大罪恶在于压迫者运用政治符码对于被压迫者的符号化——驯化为统治阶级服务。

科技革命后,机器大工业亟需大量产业工人,因而班级授课制颇受欢迎,可以多快好省出产劳工。效率、规模成为国标——统一年龄、统一场所、

统一课程、统一作息、统一内容、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统一答案。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 1632 年《大教学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普遍的艺术》)归纳总结这种契合于近代工业大生产的学校教育模式,并试图论证其合法性。该书提出诸多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并编制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确立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制订了编写教科书的原则要求,甚至对教师如何上好一堂课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教育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开始,也是符号学在教育领域从自生自发走向自觉自为。借用俄罗斯符号学家特鲁别茨柯伊的观点,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组织模式的学校教育从“标出项”(the marked)走向“非标出项”(the unmarked)。人的教育性与符号化空前迫切,加之人类文明的累进叠加,使人之精神的符号化日益紧凑高效,而身体符号化却日益走向反动。

学校教育之能指(教育教学)开始与教育之所指(生产生活)的一线实践渐行渐远,生活与社会的多维面相使意义复杂性增强,因此,像似符作为任意性最弱而理据性最强的符号,已经难以应付那个复杂的经验世界,一种理据性稍弱而任意性稍强的符号——指示符(index)开始走入人类生活。兹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文明成果的累加,出现越来越多的抽象性更强的认识对象,权当以规约符(symbol)统之。这些新式符号任意性最强而理据性最低,近乎脱离于能指本体,而成为观念中任意武断性符号,尤其自 1687 年牛顿《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降,大量科学符号犹如井喷之势充斥世界,尤其自然科学范式如同数码刀挥舞刻义,在解构对象与客体的名义下,却难免伤及主体。学校教育由是增添新的符号内容(名之曰文化和科学),学校同步演化,增添了符号标签“文化的”、“科学化的”规训与教化之特定场所。此时,学校教育的能指(教育教学)与所指(生产生活)之间逻辑距离逐渐拉大,随着科学主义泛滥,侧重实用功效的符用观大行其道,学校越来越成为某种堡垒——知识的、权力的、文化的、技术的、民主的、正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在社会转型的驱动下,以工厂车间为原型的传统学校必将退场,而个性化、开放化、虚拟化的智能学习空间将会成为主流,未来校园之墙必将破除,学校将从三尺讲台走向无边界学习。

(下转第 140 页)

绝对的东西了。在小说中,一物与他物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这才叫艺术”。^⑩劳伦斯所提倡的相对,针对的就是理性主义传统中的绝对,即抽象的理念。因此,无论是小说还是绘画,都表达了生命的闪光,穿透了理性传统的帷幕。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媒介艺术理论更应该关注的是艺术的文化功能。通过分析艺术作品所表达的生命体验,去分析它们对文化传统的冲击,在文化意义生产系统中,阐述艺术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意义的争斗。跨媒介艺术理论也就由此走出审美的乌托邦,赶往文化政治的战场。

劳伦斯对塞尚的苹果的分析是有感而发的。他的小说受到社会大众的谴责与官僚体制的压制之后,绘画作品也受到了类似的对待。在自己画册的自序中对塞尚的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这也许是他能够把在文学创作中思考的问题带入绘画评论,完成跨媒介思考的基础。这种切身性才是他的艺术思考超越了形式和技术而直接进入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劳伦斯对塞尚的评论提醒我们跨媒介的艺术研究应该关注的是“艺术事件”,无论从哪一种艺术门类切入,都应该走向更广阔的话语空间,跨越艺术门类的边界,去见证这些艺术事件的发生过程,并探究其背后潜在的脉络与张力。这才是跨媒介艺术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注释:

① D.H.劳伦斯:《劳伦斯论绘画》,载奥登等《诗人与画家》,马永波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0 页。此文原是劳伦斯为自己的画册所写的序文,题为《〈D.H.劳伦斯绘画集〉自序》。《诗人与画家》一书中所收录的为节译

本,标题为中文译者所加。中文全译本见 D.H.劳伦斯《书·画·人》,毕冰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题为《直觉与绘画——〈D.H.劳伦斯绘画集〉自序》,系中文译者所加。黑马(毕冰宾)编的《劳伦斯文艺随笔》(漓江出版社 2004 年版)中也收录了此文,标题亦为《直觉与绘画——〈D.H.劳伦斯绘画集〉自序》,译文与《书·画·人》略有出入。此处所引这句话节译本更有力。《书·画·人》中这句话译为“塞尚的苹果要比柏拉图的《理念》强多了”。见该书第 58 页。《劳伦斯文艺随笔》中这句话译为“塞尚的苹果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强多了”。见该书第 290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H. 劳伦斯:《书·画·人》,毕冰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0、71~72、55、63、60、58、59、55~56、72~73、72、72、71、74~75、61、73、56、57、59 页。

①⑤约翰·雷华德、贝纳·顿斯坦:《印象派绘画大师》,平野、陈友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 页。

①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H.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黑马译,漓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5、207、208、211、218、212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H.劳伦斯:《纯净集:劳伦斯随笔》,黑马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8、99、102~103、63、101 页。

②⑤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39 页。

②⑥梅洛-庞蒂:《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刘韵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 页。

②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42~143 页。

③③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5 页。

③④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7 页。

责任编辑 刘 洋

(上接第 155 页)

注释:

石中英:《未来学校的一种样态》,《中国教育报》2017 年 8 月 30 日。

刘庆昌:《寻找教育学的历史逻辑——兼及“教育学史”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18 年第 1 期。

黄晓珠、黄书光:《孔子对学思概念的型构及其教育方法论意义》,《教育学术月刊》2017 年第 5 期。

崔岐恩、张晓霞:《符号教育学论纲》,《高等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7 页。

崔岐恩、张晓霞:《符号教育:第三次教育浪潮》,《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 年第 6 期。

李玉:《信息技术深化多模态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11 月 30 日。

王佑镁、赵文竹、宛平、朴善曦、柳晨晨:《数字智商及其能力图谱:国际进展与未来教育框架》,《中国电化教育》2020 年第 1 期。

马大康:《符号、艺术及其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

责任编辑 余 越

Abstract: D.H.Lawrence consider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Cezanne is he can paint the “appleyness of apple”, which represents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apple. Lawre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Cezanne’s works lies in his rebellion against the rational tra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from both pictorial and literary prospects. His emphasis on the instinct and intuition in Cezanne’s works is a kind of biopolitics out of instinct against rational tradition rather tha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in a phenomenological way. The joviality for life provided by paintings is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fact that rational tradition is beyond languag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which would only be embodied adequatel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established by literature featuring think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this mode of analysis on intermedial theory studies is to remind the scholars to take perceptual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t as basis to explore the complementation among them so as to introduce intermedial studies 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politics.

Key words: D.H.Lawrence; Cezanne; appleyness; intermedial studies

From Self-Portrait to Selfie: Aesthetic Evolution of Self-image in the Vision of Artistic Media

(141)

Wang Jiequn, Zou X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Both self-portrait and Selfie are aesthetic ways to construct human self-image, both have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recording the truth, and both emphasize the manifesta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self-awareness in the works. Since the Renaissance, self-portrait has really appeared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as a painting art. From hiding behind the canvas to gradually entering the center of the picture, the artist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power construction. With the strong involvement of mobile media and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the selfie image has become a media art for the public to represent and convey themselves. From the change of mirror to chip lens, and the change of frame from fixed to moving, the self-portrait deconstructs the artistic authority established by artists in the era of self-portra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misidentifica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absence” of individuals. By comparing the aesthetic evolution of self-portrait and selfie,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artistic media on portrait art, society and ou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self-portrait; selfies; medium

The Future of the School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Sign Evolution

(149)

Cui Qien, Wang Zhirong, Zhao Min

(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 education, education is the symbolization of the purpose of life happiness. Signs a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s existence and the evidence of human beings. About 5 million years before, when the ape album, the education sign’s signifier(education teaching)and signified (production and life) were confused and began to symbolize. Somebody had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sign had not yet been created. The first school sign began to appear in China’s first slave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BC, and its original meaning was: a specific place (or a specific place of symbolization) where the educated received discipline. Its initial sign is extremely simple, that is, instrumental—the semiotic organization of the transition from natural person to social person.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 of education, the 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ed increased, and school signs continued to be symbolized again, with additional meanings, such as “fixed”, “systematic”, “politicize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In the third wave of educa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AI&VR sign, the logical distance regression between education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was 00, and education center went through from the previous wave to the third wave successively: uncentered, teacher, student, learning. As a special place for discipline and education, schools have increasingly lost their legitimac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signs of reality—education virtualization and virtual education reality.

Key words: school; sign; education; semiot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semiotics; semiotics

责任编辑 王三炼